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推进路径

张旺¹, 白永秀¹, 张静坤²

(1.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2. 西京学院会计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3)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共建富裕+共享富裕+共生富裕, 共建富裕意味着大家一起奋斗勤劳致富, 共享富裕意味着贫富差距缩小, 共生富裕意味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共生富裕是可持续地共建富裕和共享富裕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 重塑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廓清时空分异特征, 提炼推进路径。研究发现: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整体上偏低但呈递增态势, 区域间差异是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 空间相关性较弱; 中国共产党探索共同富裕有始终创造条件和始终分阶段有重点地逐步推进两个历史经验, 始终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推进, 提炼出新征程上主要有党的领导、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4条关键路径。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共同富裕; 时空分异; 推进路径

中图分类号: D24; D616;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23)01-0171-15

Temporal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promotion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ZHANG Wang¹, BAI Yongxiu¹, ZHANG Jingkun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2. School of Accounting, Xijing University, Xi'an 710123, China)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equals to the sum of co-construction prosperity, shared prosperity and symbiotic prosperity. Co-construction prosperity means that everyone works hard to become rich, shared prosperity means that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is narrowed, and symbiotic prosperity means that people and nature coexist in harmony. Symbiosis prosperity is a prerequisite for sustainable co-construction prosperi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On this basis, wereconstructs the indicator system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larif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est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refines the path of promo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low on the whole but increas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the main source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with weak spatial correlation; Digital economy,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收稿日期: 2022-10-20 修回日期: 2022-12-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部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及政策研究”(21ZDA06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涉农平台经济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研究”(22CJY04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的理论机理、效应及路径研究”(2022MD723842)。

作者简介: 张旺(1990—), 男, 河南新乡人, 博士,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科研人员, 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通信作者: 张静坤。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influence is heterogeneous, and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decreases accordingly; The CPC has two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 exploring common prosperity: always creating conditions and always advancing in stages and with emphasis, always advancing around the concept of “taking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and refining four key paths in the new journey, namely,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of demonstration areas and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propulsion Path

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这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共同富裕的阶段目标,承诺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和 2050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视作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将共同富裕鲜明地写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旗帜上。党的二十大以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至此,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共同富裕内涵有何延申和扩展?中国不同省域、不同区域共同富裕水平如何?新征程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有哪些关键路径?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强烈的现实和理论指导意义。

一、理论逻辑与文献综述

(一) 逻辑关系

虽然,党和政府文件中多次将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联系在一起,但是学术界对两者的理论研究明显比较匮乏,并且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者逻辑关系上。从两者逻辑关系来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中国式现代化是有别于西方国家现代化,既有现代化的一般含义,又有中国式的特殊含义,由此推断出共同富裕存在一般内涵和特殊内涵^[2]。我们要实现的共同富裕和要推进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存在天然内在的联系,在实践中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引领现代化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3]。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意蕴共通^[4],追求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创新与超越,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5]。共同富裕具有全体性、全面性、差异性和渐进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规模巨大、全面发展、协调共生、和平推进具有内在的一致性^[6]。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具有多重逻辑关联,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科学内涵包括人民性、渐进性、全面性、全球性和共建共享^[7]。实际上,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共同富裕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两者具有同一的历史进程,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贯穿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8]。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是更富裕的“均衡分布”物质富裕、更完善的“社会共同体”政治文明、更公平的“共建共享”社会氛围三者的统一^[9]。

(二) 研究现状

从共同富裕理论内涵来看,杨文圣等^[10]从法理、生产、分配视角,提出共同富裕包括“共有、共建、共享”“协同关系和同一关系”两层含义。万海远等^[11]从内涵外延视角,认为共同富裕包括发展和共享两大方面。孙豪等^[12]认为富裕和共享是共同富裕最重要、最核心的内涵。韩亮亮等^[13]认为共同富裕有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 3 个关键元素。席恒等^[14]提出共同富裕是国民财富的共同程度与富裕程度所形成的合力。高鸣等^[15]认为在过程和阶段上,共同富裕涵盖了共建共富、逐步共富两个方面。李海舰等^[16]同样认为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全面富裕、渐进富裕、共建富裕。从共同富裕内涵特征来看,刘培林等^[17]从政治、经济、社会视角,提出共同富裕实质就是全体人民共创共享

日益美好的生活概括,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围绕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郑石明等^[18]从系统视角,认为共同富裕是由富裕度、平等度和共享度3个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只有3个子系统在整体联动与动态调整中向有序化转变、实现协调与统一,才能真正实现向共同富裕目标的有序化发展。从共同富裕量化评价来看,申云等^[19]以富裕形态为视角,从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维度构建一级指标,考察了省域层面共同富裕水平。张金林等^[20]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和社会共享3个维度构建一级指标,以家庭数据为样本考察了省域层面不同截面水平。傅才武等^[21]单独对精神共同富裕进行指标体系构建,提出文化获得、文化参与、文化享受、文化发展4个一级指标。从共同富裕影响因素来看,向云等^[22]认为数字经济具有提升总体富裕水平的“做大蛋糕”效应,又具有推进共享富裕的“分好蛋糕”效应。刘明月等^[23]认为乡村振兴战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和区域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徐鹏杰等^[24]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供给和需求两端入手,提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可以有效促进共同富裕。从共同富裕实现路径来看,赖德胜^[25]从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改善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统筹城乡区域发展阐述了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方世南^[26]认为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走以经济建设推动物质文明、以政治建设推动政治文明、以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精神文明、以社会建设推动社会文明、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协调发展之路。

(三)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具有强烈的逻辑关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研究还是相对比较割裂,反而对共同富裕的研究相对较多,在共同富裕的内涵延展、评价维度与考察时空方面均留下可拓展空间,尤其是涉及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量化

研究更是凤毛麟角。首先大多文献普遍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构建一级指标,或将两个维度扩充为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均未在指标体系中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缺乏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注;其次有关共同富裕指标体系遴选依据不完善,缺乏指标遴选过程,二级指标构成参差不齐和视角不完备;最后对于共同富裕推进路径研究依据不充分,大多数实现路径太过宏观,更未能牢牢抓住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上述3点可拓展之处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共同富裕研究的短板,也正是本文研究的切入点。《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因此,本文在厘清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内在逻辑关系基础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为框架,对共同富裕内涵进行延申和扩展,进而重塑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并测度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期内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提出“省域—区域—空间”立体型时空分析框架,最后依据历史经验和推进理念,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加具体的推进路径,以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二、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构建

(一)内涵延展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重心仍然是共同富裕,这里的共同富裕是指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富裕,用于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际上,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概念,其内涵自然也会随着中国的生产力发展而不断扩大和充实^[27],内涵标准随时间也会有所变化^[11],加上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之间具有强烈的逻辑关系和契合点,因此有必要将共同

富裕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体系中予以延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普遍性,更有基于中国特色的特殊性。从普遍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至少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在物质文明方面,要求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使得一个国家的总体财富处在一种相对饱和状态,社会形态也更加先进;在精神文明方面,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结合和同步发展,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升华,两者是一个互相促进、相互协调的有机关系。不论是物质文明滞后于精神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滞后于物质文明,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从特殊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口规模巨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 4 个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味依靠自由市场自发性分散决策的现代化,而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现代化;在人口规模巨大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少数人、少数地区、少数行业的现代化,而是人群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不断缩小的现代化,是 14 亿人的现代化;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化,而是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发展的现代化;在走和平发展道路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不是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的现代化,而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人类探索共同富裕之路从未间断过,人们对共同富裕的认识在探索中逐步加深。共同富裕是物质、精神、生态的多重富裕,共同富裕内涵具有多层次性,要想科学地理解共同富裕必须从以下 4 个属性进行总体把握。一是共同富裕具有创造性,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充分激发全体人民能动性和创造力的奋斗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二是共同富裕具有系统性,共同富裕不仅

包括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还包括生态宜居、社会和谐和公共服务^[28]。正如《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所描绘的那样“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三是共同富裕具有共享性,共同富裕是包括每个中国人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达到的一种富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四是共同富裕具有可持续性,共同富裕是与人口、资源 and 环境承载力相协调的一种富裕,蕴含着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富裕不是一时一地的富裕,而是建立在环境友好型、生态保护型基础上的富裕,必须是不损害后续发展的富裕^[29],既要建立在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上,也要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30],这意味着共同富裕既要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能以牺牲环境质量、破坏自然资源和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31]。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将共同富裕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体系下不难发现,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明显存在以下 3 处契合点。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与共同富裕的创造性相契合,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需要全体中国人民辛勤劳动、创新劳动、创业劳动来共同创造的;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巨大与共同富裕的共享性相契合,两者都是在传递一种“不落下一人”和“人人共享”实施思路,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不是少数人的、不是部分人的;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共同富裕的系统性和可持续性相契合,两者都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都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要持续推动,不断取得成效”。上述 3 个契合

点,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科学内涵的精髓之所在,所以本文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科学内涵包括共建富裕、共享富裕和共生富裕3个关键要义,共建富裕意味着大家一起奋斗勤劳致富,共享富裕意味着贫富差距缩小,共生富裕则意味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即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共建富裕+共享富裕+共生富裕,进一步将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界定为“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的同时,贫富差距不断缩小、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从3个关键要义的逻辑关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是共建富裕、共享富裕、共生富裕的三者统一^[32],共生富裕是持续推动共建富裕和共享富裕的前提条件,共建富裕为共生富裕和共享富裕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共享富裕为共建富裕和共生富裕的最终目标,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不仅是人人共建的富裕,不仅是人人共享的富裕,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富裕,是共建富裕、共享富裕和共生富裕三者的统一,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生命共同体”的真实写照。

(二) 指标构建

根据内涵延展可知,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可以从人人共建、人人共享、人与自然共生3个维度予以刻画。其中,人人参与、人人努力的建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人人共享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持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因此,从共建富裕、共享富裕、共生富裕三者分裂走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三者统一目标,既要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能动性和创造力,鼓励劳动者通过辛勤劳动、创新劳动、创业劳动实现增收致富,又要不断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更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首先,共建富裕反映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发展问题,发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第一要务。共建富裕代表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体现着国民的物质富裕、精神富足和生活宽

裕,客观上应包括物质生活水平、精神文化水平等多个方面。本文从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视角,遴选共建富裕二级指标,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劳动生产率、城镇化率和失业率五个指标刻画共同富裕在物质富裕方面的共建情况,采用人均文教支出、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公共图书馆藏量3个指标刻画共同富裕在精神富裕方面的共建情况。

其次,共享富裕反映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公平问题,公平是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本质追求。共享富裕代表着社会财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分布情况,体现着国民拥有社会财富的均等化程度,客观上应包括三大差距(人群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公共服务普及率等方面。本文鉴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处于高位的情况,选取人群收入差距、地区发展差距、城乡消费差距3个指标刻画共同富裕在缩小三大差距方面的共享情况,采用居民收入增长弹性、居民性财政支出比重、公共交通、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强度、卫生员人数6个指标刻画共同富裕在公共服务普及率方面的共享情况。

最后,共生富裕反映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质量问题,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共生富裕代表着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水平,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客观上应包括低碳排放、污染治理和绿色创新等方面。本文依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选取GDP能耗、GDP碳排放、PM_{2.5}浓度3个指标刻画共同富裕在碳排放方面的共生情况,选取森林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环卫设备台数3个指标刻画共同富裕在污染治理方面的共生情况,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刻画共同富裕在绿色创新方面的共生情况。

因此,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共建富裕+共享富裕+共生富裕公式为根本依据遴选一级评价指标,以学术界成果为理论依据和以数据可获得性为现实依据遴选二级指标,最终重塑后的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25个二级指标,具体依据和遴选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单位,属性)	二级指标衡量公式	权重	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 共同富裕	共建富裕 (0.409) N、L ^[10,16]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	0.031	文献[14]
		恩格尔系数(%,-)	食品支出总额/消费支出总额	0.016	文献[12]
		人均GDP(万元,+)	GDP/年平均人口	0.056	文献[18]
		劳动生产率(元/人,+)	GDP/年平均从业人数	0.062	文献[17]
		城镇化率(%,+)	地区城镇常住人口/地区常住总人口	0.035	文献[12-13]
		失业率(%,-)	失业人口/地区常住总人口	0.030	文献[29]
		人均文教支出(元,+)	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	0.045	文献[31]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文盲数×1+小学人数×6+初中人数×9+高中和中专人数×12+大专及本科以上人数×16)/6岁以上人口总数	0.034	文献[13]
		公共图书馆藏量(册/人,+)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册)	0.099	文献[12]
	共享富裕 (0.312) N、L ^[12,22]	人群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	0.048	文献[17,22]
		居民收入增长弹性(*,+)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GDP增长率	0.027	文献[12]
		地区发展差距(元,-)	地区间人均财富差距	0.053	文献[12,22]
		城乡消费差距(*,-)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0.033	文献[20]
		民生性财政支出比重(%,+)	(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0.014	文献[12]
		公共交通(标台,+)	每万人拥有的公共交通工具	0.035	文献[13,29]
		义务教育(%,+)	普通高校生师比	0.014	文献[31]
		社会保障强度(%,+)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0.061	文献[13,31]
		卫生员人数(人/千人,+)	每千人中卫生技术人员	0.027	文献[12,18]
	共生富裕 (0.279) N	GDP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能源消费量/GDP	0.016	文献[29,31]
		GDP碳排放(千克/万元,-)	CO ₂ 排放量/GDP	0.014	文献[13,29]
		PM _{2.5} 浓度(微克/立方米,-)	***	0.014	文献[18,28]
		森林覆盖率(%,+)	森林面积/土地总面积	0.059	文献[13,31]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无害化处理的垃圾量/总处理垃圾量	0.010	文献[18]
		环卫设备台数(台/万人,+)	市容环卫车辆台数/地区常住总人口	0.092	N、S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能源消费量;GDP;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工业SO ₂ 、工业废水(SBM-DDF方法)	0.073	N、S

注:N表示根本依据,L表示理论依据,S表示现实依据

本文以新时代 10 年伟大变革期(2011—2020 年)30 个省份面板数据为考察样本,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较性,暂不考虑西藏以及港澳台地区。原始数据主要通过 EPS 数据平台中“三农数据库”“宏观经济数据库”“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下载,对于部分缺失的值采用插值法进行填补。其中,CO₂ 排放量是由原煤、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油田天然气 8 种主要化石能源消费折算得到,CO₂ 排放系数分别为 1.900 3kg CO₂/kg、2.860 4kg CO₂/kg、3.020 2kg CO₂/kg、2.925 1kg CO₂/kg、3.017 9kg CO₂/kg、3.095 9kg CO₂/kg、3.170 5kg CO₂/kg、2.162 2kg CO₂/m³,八种化石能源数据来源于 EPS 数据平台中“中国能源数据库”;PM_{2.5}数据来自达

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为了后续时空分异特征分析,本文将中国 30 个省份,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大经济区^①。

(三)方法介绍

1. 熵权法

囿于篇幅所限,有关熵权法相关介绍不再赘述,计算程序参考刘秉镰等^[33]、张旺等^[34]学术成果,具体程序如下。

(1)标准化处理:

$$\begin{aligned} Z'_{xy} &= \frac{Z_{xy} - \min(Z_{xy})}{\max(Z_{xy}) - \min(Z_{xy})} (+) \\ Z'_{xy} &= \frac{\max(Z_{xy}) - Z_{xy}}{\max(Z_{xy}) - \min(Z_{xy})} (-) \\ x &= 1, 2, 3; y = 1, 2, \dots, n' \end{aligned} \quad (1)$$

① 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

式(1)中, Z_{xy} 是第 x 个子系统第 y 个指标值, Z'_{xy} 是指标标准化结果, $\max(Z_{xy})$ 是指标 Z_{xy} 最大值, $\min(Z_{xy})$ 是指标 Z_{xy} 的最小值。

(2) 计算第 x 个子系统第 y 个指标的比重:

$$d_{xy} = Z'_{xy} / \sum_{x=1}^3 Z'_{xy} \quad (2)$$

(3) 计算第 y 个指标信息熵:

$$e_y = -1/\ln(3) \sum_{x=1}^3 (d_{xy} \ln(d_{xy})) \quad (3)$$

(4) 计算第 y 个指标权重:

$$\psi_y = -(1 - e_y) / \sum_{y=1}^{n'} (1 - e_y) \quad (4)$$

(5) 计算第 x 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

$$D_x(e_x) = \sum_{y=1}^{n'} \psi_y \times d_{xy} \quad (5)$$

(6) 合并为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

$$ComP = \sum_{x=1}^3 D_x(e_x) \quad (6)$$

2. Dagum 基尼系数及分解法

通过计算 Dagum 基尼系数并分解来探寻地区差异来源,其计算公式为^[35]:

$$G = \frac{\sum_{j=1}^k \sum_{h=1}^k \sum_{i=1}^{n_j} \sum_{r=1}^{n_h} |y_{ji} - y_{hr}|}{2n^2 \bar{y}} \quad (7)$$

式(7)中, G 是总体基尼系数; y_{ji} (y_{hr}) 是 j (h) 区域内各省发展水平,即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 $\bar{y}$ 是区域平均值; n 是省份个数, k 是区域个数, $n = 30$, $k = 3$; n_j (n_h) 是 j (h) 区域内省份数, j, h 为 3 个区域中不同的区域,且 $j = 1, 2, 3$, $h = 1, 2, 3$; i, r 为 j (h) 区域内不同省份,且 $i = 1, 2, 3, \dots, r = 1, 2, 3, \dots$ 。则区域 j 的基尼系数 G_{jj} 以及区域 j 和区域 h 之间的基尼系数 G_{jh} 分别为:

$$G_{jj} = \frac{\sum_{i=1}^{n_j} \sum_{r=1}^{n_j} |y_{ji} - y_{jr}|}{2n_j^2 \bar{y}_j} \quad (8)$$

$$G_{jh} = \frac{\sum_{i=1}^{n_j} \sum_{r=1}^{n_h} |y_{ji} - y_{hr}|}{n_j n_h (\bar{y}_j + \bar{y}_h)} \quad (9)$$

式(8)~式(9)中, $\bar{y}_j$ 和 $\bar{y}_h$ 是区域 j 和区域 h 的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均值。总体基尼系数 G 可分解为 G_w 、 G_{nb} 和 G_m 3 个部分,满足 $G = G_w + G_{nb} + G_m$ 。其中, G_w 表示三大区域内差异; G_{nb}

表示三大区域间差异; G_m 表示三大区域交叉影响的一种基尼系数余额,又被称为超变密度,计算公式参考张旺等^[36]学术成果。

3. 莫兰指数

采用莫兰指数 (Moran's I) 检验各省发展水平是否在空间上存在相关性,计算公式为:

$$\text{Moran's } I = \frac{n}{S} \frac{\sum_{e=1}^n \sum_{f=1}^n w_{ef} (u_e - \bar{u})(u_f - \bar{u})}{\sum_{e=1}^n (u_e - \bar{u})^2} \quad (10)$$

式(10)中, w_{ef} 是省份 e 和省份 f 之间的空间权重; $S = \sum_{e=1}^n \sum_{f=1}^n w_{ef}$ 是所有空间权重集合; 平

均值 $\bar{u} = \frac{1}{n} \sum_{e=1}^n u_e$; $n = 30$ 为空间省份数; u_e 表示 e 省份发展水平。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 Moran's I 取值介于 $[-1, 1]$ 之间,若 Moran's I 显著为正,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较高(或较低)的区域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相关性,数值越大相关性越强。反之,则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数值绝对值越大,空间差异越大。为将这种相关性可视化,假设 z 是观测值与均值的离差向量 ($z = u_e - \bar{u}$), wz 为其空间滞后向量, Moran's I 则为 z 与 wz 的相关系数,将 z 与 wz 绘制成散点图,称为莫兰散点图。

三、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时空分异特征

提出“省域—区域—空间”三位一体的立体型时空分析框架,分别从时序演化特征、区域差异来源和空间相关性 3 个层次分别讨论,旨在更加全面地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时空分异特征,为后续推进路径提炼提供实践指导和奠定现实基础。

(一) 时序演化特征

通过熵权法,计算各个指标权重,最后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结果见表 2。

总体上,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呈现逐步递增态势,均值由 2011 年的 0.259 增长至 2020 年的 0.387,年均增长率为 1.275%,但不同省份、不同区域的演化趋势存在明显差异。从各省均值时序演化来看,北京(0.510)、上海(0.461)、天津(0.379)、浙江(0.377)、海南(0.369)等东部地区水平较高,新疆(0.270)、山西(0.265)、安徽

(0.258)、河南(0.250)等中部地区水平较低。从各省份增速时序演化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呈现逐步递增态势,其中北京(2.150%)、湖北(1.760%)、江苏(1.684%)、天津(1.586%)、福建(1.512%)等东部省份增长率较快,宁夏(0.985%)、重庆(0.979%)、四川(0.973%)、浙江(0.924%)、陕西(0.877%)等西部省份增长率较慢。综合而言,人人每天都在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着,每个省份每天都走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上,每天都在接近于共同富裕,今天共同富裕水平都比过去共同富裕水平高,未来共同富裕水平都比今天共同富裕水平高,共同富裕基本方向从未改变,共同富裕初心使命从未动摇。

从一个侧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整体上普遍较低,样本考察期,各省各年份均值均在 0.196 至 0.643 之间波动,年均增长率均在

0.924% 至 2.150% 之间,都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间接反映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艰巨的过程,它仍将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长远目标。但是,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条件,主要体现在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的经济条件,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条件,形成了共创、共建、共享社会发展合力的社会条件^[9]。本文基于共同富裕三阶段规划,以上述均值和增长率研判,到“十四五”规划末(2025 年),能够实现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发生实质性变化,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 21 世纪中叶(2050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

表 2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

区域	省份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均值	增速/%
东部地区	北京	0.428	0.441	0.458	0.462	0.483	0.486	0.540	0.559	0.601	0.643	0.510	2.150
	天津	0.310	0.332	0.328	0.359	0.348	0.372	0.406	0.426	0.437	0.469	0.379	1.586
	河北	0.196	0.228	0.232	0.230	0.236	0.242	0.289	0.297	0.313	0.343	0.261	1.469
	辽宁	0.274	0.283	0.292	0.318	0.375	0.365	0.392	0.391	0.404	0.398	0.349	1.233
	上海	0.409	0.424	0.427	0.385	0.422	0.483	0.514	0.492	0.509	0.550	0.461	1.410
	江苏	0.274	0.260	0.294	0.290	0.314	0.323	0.383	0.391	0.442	0.442	0.341	1.684
	浙江	0.319	0.309	0.362	0.375	0.369	0.372	0.388	0.424	0.447	0.411	0.377	0.924
	福建	0.268	0.269	0.279	0.303	0.340	0.312	0.358	0.361	0.403	0.419	0.331	1.512
	山东	0.237	0.226	0.275	0.279	0.295	0.321	0.333	0.331	0.365	0.337	0.300	1.008
	广东	0.283	0.303	0.294	0.314	0.354	0.376	0.367	0.383	0.389	0.384	0.345	1.008
中部地区	海南	0.307	0.297	0.306	0.337	0.322	0.367	0.402	0.440	0.462	0.455	0.369	1.482
	山西	0.205	0.209	0.244	0.233	0.247	0.253	0.299	0.301	0.335	0.326	0.265	1.211
	内蒙古	0.291	0.274	0.279	0.300	0.304	0.329	0.334	0.361	0.358	0.394	0.322	1.031
	吉林	0.264	0.240	0.259	0.295	0.313	0.326	0.321	0.332	0.383	0.406	0.314	1.426
	黑龙江	0.250	0.259	0.264	0.305	0.315	0.315	0.324	0.336	0.376	0.354	0.310	1.042
	安徽	0.192	0.233	0.204	0.259	0.245	0.257	0.264	0.285	0.302	0.334	0.258	1.425
	江西	0.234	0.267	0.278	0.290	0.294	0.301	0.336	0.325	0.325	0.347	0.300	1.126
	河南	0.199	0.226	0.195	0.220	0.257	0.233	0.279	0.270	0.281	0.343	0.250	1.446
	湖北	0.201	0.254	0.274	0.268	0.290	0.311	0.349	0.360	0.394	0.377	0.308	1.760
	湖南	0.248	0.257	0.239	0.299	0.313	0.315	0.314	0.332	0.361	0.375	0.305	1.265
西部地区	广西	0.236	0.268	0.255	0.292	0.320	0.305	0.332	0.342	0.360	0.357	0.307	1.208
	重庆	0.281	0.266	0.284	0.286	0.290	0.297	0.343	0.369	0.385	0.379	0.318	0.979
	四川	0.251	0.223	0.262	0.242	0.276	0.274	0.315	0.315	0.319	0.348	0.283	0.973
	贵州	0.216	0.225	0.233	0.281	0.274	0.307	0.307	0.341	0.340	0.332	0.286	1.157
	云南	0.237	0.258	0.272	0.275	0.278	0.293	0.334	0.355	0.348	0.356	0.301	1.183
	陕西	0.291	0.303	0.317	0.309	0.348	0.348	0.343	0.370	0.373	0.378	0.338	0.877
	甘肃	0.206	0.252	0.235	0.259	0.255	0.286	0.318	0.312	0.344	0.320	0.279	1.141
	青海	0.246	0.267	0.281	0.279	0.272	0.304	0.308	0.324	0.331	0.392	0.300	1.462
	宁夏	0.212	0.234	0.256	0.288	0.308	0.296	0.314	0.331	0.331	0.311	0.288	0.985
	新疆	0.214	0.244	0.217	0.232	0.280	0.310	0.275	0.299	0.306	0.321	0.270	1.077
全国	均值	0.259	0.271	0.280	0.296	0.311	0.323	0.346	0.359	0.377	0.387	—	—

进一步地,对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进行聚类分析,将其分为高水平地区、较高水平地区、中等水平地区、低水平地区。高水平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和浙江,以东部地区直辖市为主,其具有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和工业化水平高的先天优势,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较高水平地区包括海南、辽宁、广东、江苏、陕西、福建、内蒙古、重庆、吉林、黑龙江,虽然比不上第一类直辖市,但凭着东部临海优势,仍处于前列;中等水平地区包括湖北、广西、湖南、云南、江西、山东、青海,主要集中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低水平地区包括宁夏、贵州、四川、甘肃、新疆、山西、河北、安徽、河南,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和少量中部地区,发展潜力较大。总括,中部和西部地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重点地区,也是新征程上政策制定的主要倾斜地区。

(二) 区域差异来源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的 Dagum 基尼系数计算及分解情况,见图2。

图1a呈现的是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考察期内,总体基尼系数呈现波动中下降态势,仅个别年份出现轻微上升,这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总体差异正在缩小,但是缩小幅度不大。基尼系数由2011年的0.1124下降至2020年的0.0880,下降了0.0244,降幅为21.71%,说明总体差异降幅不大,并且基尼系数始终维持在0.15之下,说明总体差异不严峻。这与表2结果一致,得分最高的北京(0.510)是得分最低河南(0.250)的2.04倍,究其原因,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是共建富裕、共享富裕、共生富裕三者的统一体,不仅代表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也代表了人与自然关系,虽然各地区在某一方面具有自然禀赋优势,但综合起来相差并不大。此外,总体差异呈现波动特征,2011—2012年下降,由2011年的0.1124下降至2012年的0.0928,下降了0.0196,降幅为17.44%;2013年为0.1011,上升了0.0083,增幅为8.94%;2014年下降为0.0878,下降了0.0133,降幅为13.16%;2015年和2016年分别上升为0.0892和0.0902,增幅分别为1.59%和2.73%;2017年和2018年分别下降为0.0872和

0.0880,降幅分别为3.32%和2.44%;2019年为0.0911,上升了0.0031,增幅为3.52%;2020年又降为0.0880,降幅为3.40%。总之,总体差异降幅逐渐减小,说明促使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提升的难度在增加。

图1b呈现的是区域内基尼系数。由结果来看,均呈现波动中下降趋势,区域内基尼系数普遍偏低。具体而言,东部地区2011—2020年分别为0.1159、0.1173、0.1062、0.0979、0.0959、0.0983、0.0917、0.0934、0.0901、0.1034,总体下降了0.0125,降幅为10.79%,其中2012年和2016年呈现上升趋势;中部地区2011—2020年分别为0.0781、0.0454、0.0643、0.0582、0.0520、0.0618、0.0465、0.0508、0.0586、0.0407,总体下降了0.0374,降幅为47.89%,其中2013年、2016年、2019年呈上升趋势,中部降幅相对较大;西部地区2011—2020年分别为0.0638、0.0498、0.0590、0.0443、0.0476、0.0312、0.0326、0.0390、0.0377、0.0434,下降了0.0204,降幅为31.97%,其中,2013年、2015年、2020年呈上升趋势。总之,东部区域内差异普遍大于中部和西部,东部降幅却小于中部和西部,也就是说,东部地区的贫富差距要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贫富差距。

图1c呈现的是区域间基尼系数。从降幅大小来看,中—西(40.07%)降幅最大,东—中(25.5%)降幅排名第二,东—西(8.60%)降幅最小。从均值大小来看,东—中(0.1251)均值最大,东—西(0.1187)均值第二,中—西(0.0540)均值最小。由此推断,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差距较大,中部与西部差距较小,中部与西部、东部与中部差距缩小的幅度最大,主要得益于中部崛起和西部振兴战略。然而,东部与西部差距缩小幅度最小,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异军突起,发展太过迅猛,西部追赶速度远不及东部增长速度,间接形成一种阻碍东部与西部差距缩小的反作用力。因此,党中央在制定国家战略时应该注重区域带动效应,政府制定政策时应该鼓励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

图1d呈现的是总体差异分解情况。从贡献程

度来看,区域间差异贡献率最大,变动区间位于 51.81% ~ 64.34%,平均贡献率为 58.02%,说明区域间差异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变动区间为 24.41% ~ 28.83%,平均贡献率为 26.53%;基尼系数余额位于 11.12% ~ 20.59%,平均贡献率为

15.45%。本文认为要破解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总体差异问题,必须着重从缩小区域间差异角度出发,而要想解决区域间差异应该重点从区域协调发展视角加快区域生产要素流动,提高区域间生产要素流动效率,以促进各区各省均衡健康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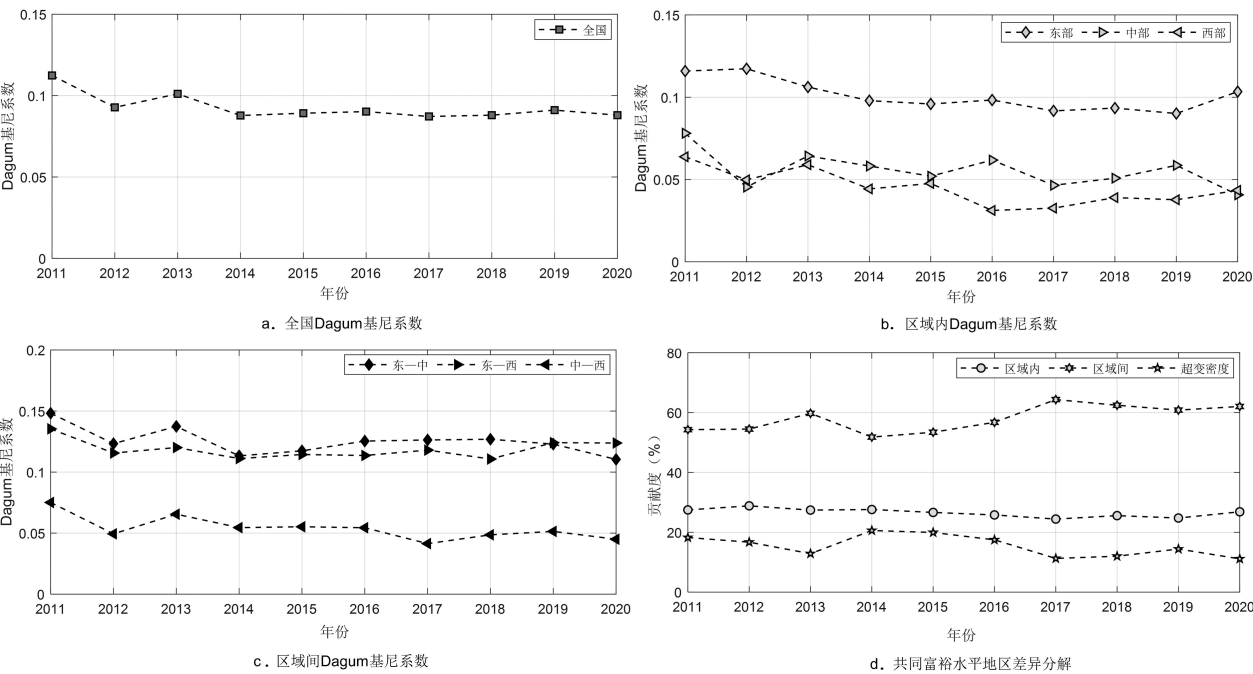


图 1 Dagum 基尼系数及分解情况

(三)空间相关性

计算莫兰指数,并采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检验其显著性,结果见表 3。

表 3 莫兰指数及显著性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Moran's I	0.276	0.277	0.252	0.220	0.209	0.219	0.213	0.212	0.205	0.201
Z 值	2.727	2.762	2.522	2.300	2.205	2.327	2.248	2.197	2.145	2.122
P 值	0.006	0.006	0.011	0.021	0.027	0.019	0.024	0.027	0.031	0.033

由表 3 可知,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的 Moran's I 均在 0.244 ~ 0.281 波动,数值普遍偏低,估计值全部为正,且均在 1% 和 5% 水平下显著,总体呈现下降态势,局部呈现先上升再下降又上升再下降趋势(M 型),2012 年达到最大值(0.277)。这充分说明,考察期内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相似(H-H 和 L-L)省份在空间上虽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并不强烈,省份与省份之间的带动效应并不明显,而且这种

集聚现象随着时间推移,并未加强反而在减弱,侧面反映出,先富带动后富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作用不明显,先富与后富的差距存在扩大的风险^[37-38]。为了更加清晰展现各省份空间分布演进轨迹,分别对 2011 年、2014 年、2017 年、2020 年绘制莫兰散点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显示,大部分省份落在第一象限(H-H)和第三象限(L-L),尤其是第三象限,该结果拒绝了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在空间上随机分布的假设,进一步印证了其在地理空间上呈现一定程度的集聚现象,只是这种集聚现象并不强烈,有待加强和政策刺激。进一步而言:其一,东部各省(市)全部落在第 I 象限高值集聚区,而中部、西部各省(市)则大部分落在第 III 象限低值集聚区,省域差异和区位优势显得尤为突出;其二,根据 2011 年→2014 年→2017 年→2020 年莫兰散点图呈现

的演进规律,考察期内大多省份并未发生跃迁,但有4个省份发生了跃迁现象,北京由高值集聚区(第I象限)跃迁至由高值被低值包围区(第IV象限),广西由低值集聚区(第III象限)跃迁至低值被高值包围区(第II象限),青海和贵州由低值集聚区(第III象限)跃迁至高值被低值包围区(第IV象限)。针对发生跃迁的省份,政府部门在制定政

策时应该予以重点考虑,需要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总而言之,大部分省份处于低值集聚区且样本考察期内未变动,再次印证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普遍较低,增长速率较慢,具有长期性。因此,当务之急仍然是给予处于低值集聚区的省份更多政策支持,尽可能缩小各省之间差距和弥合鸿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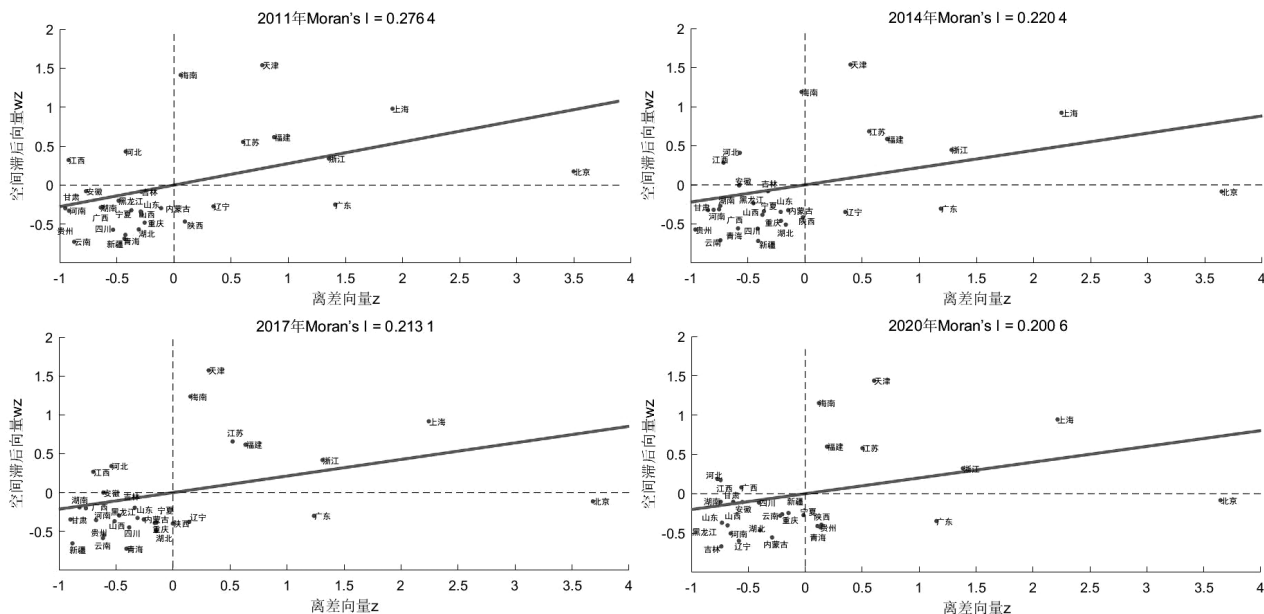


图2 莫兰散点图(隔3年汇报)

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推进路径提炼

(一) 历史经验

1. 始终为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共同富裕最大的敌人是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导致社会财富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源,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历经28年浴血奋战,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政权基础)。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制度基础)。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前夕,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根本性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制基础)。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前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继续前行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重要保障。从党的二十大召开之日起,中国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尤其是未来5年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而高质量发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明确了未来举什么旗,以什么样的姿态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成为

举旗定向的政治宣言,引领复兴的行动纲领。

2. 始终分阶段有重点地逐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目标,实现上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根据不同发展阶段有重点地逐步分区域实施。中国是农业大国,共同富裕的根本问题是农民的问题,“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充分认识到共同富裕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把为广大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致力于使农民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解放出来”^③。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共同富裕仍然停留在理想信念层面。直到 1953 年 12 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首次提到“共同富裕”,强调“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④,至此共同富裕理想信念进入实施阶段。1978 年 12 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确立“先富—后富—共同富裕”实现路径,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以沿海城市为重点、以广袤农村为示范,以农业改革为起点,采取了分阶段有重点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战略。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做了“两步走”战略规划、打赢脱贫攻坚战消灭了绝对贫困问题、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将促进农村共同富裕作为实践重点。党的二十大以后,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

(二) 推进理念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向着共同富裕理想目标不断迈进的历史。自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共同富裕始终围绕“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理念,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现代化特征的中国道路。人民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实践者与成果享

受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自近代以来积淀形成的最广泛、最深刻、最长远、最广泛的社会价值诉求。人人参与的共建富裕和人人共享的共享富裕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直接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生富裕也是“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理念的一种间接体现,因为自然环境是人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其实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与其他执政党不同之处是“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和“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诞生以来始终把《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担负在肩,正如《中国共产党章程》所言“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以及现如今踏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辟出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正以昂首阔步的姿态向前迈进。

(三) 关键路径

在时空分异特征分析的现实基础上,充分吸纳历史经验后,紧扣推进理念,围绕党的领导、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四个层面,提炼出未来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四大关键路径,为完成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历史任务提供指导。

1. 在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领导路径。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样、

②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载于《求是》2021 年第 20 期。

③ 习近平《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载于《求是》2022 年第 7 期。

④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437 页。

资源禀赋差异巨大的国度,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毫无疑问,也是在人口规模巨大基础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主心骨和核心力量。党的百年奋斗史深刻昭示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有今天的伟大成就,根本原因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党的领导是民族复兴底气的来源,是打造全国一盘棋的关键,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基础,是协调各方利益、动员各方力量的保障。实际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实践和不断总结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强化自身建设,勇于自我革命,总能带领中国人民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所以,在中华大地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全面领导作用和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作用,必须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2. 在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高质量发展代表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成色是十足的,代表着坚实的物质基础、高水平的精神文明、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案,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推进要追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创新收入分配机制,使发展成果最大限度惠及弱势群体(弱势行业、弱势产业),从而提高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和收入水平,缩小人群、地区、城乡之间差距。本文认为,高质量发展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成色,这种成色十足的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

是共建富裕、共享富裕和共生富裕的高度统一,目前阶段,决定成色是否十足的关键点在农村,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实现机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可以概括为在“三位一体”^⑤分配机制中不仅要体现对农民收入的作用,还要体现出在农业、农村中的作用,这种分配机制通过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德社会相互作用,为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效率、公平、道德三方面的保障。

3. 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推进

共同富裕示范区是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是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是文明和谐美丽家园展示区。示范区建设除了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范例之外,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提供了实现方式,大大提升了国家战略的操作性和落地性。实践表明,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进程必然出现先后、快慢之分,也就是说,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在实现共同富裕上不可能齐头并进,示范区建设显得就尤为重要。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标志着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迈入具体实施阶段,为探索中国路径和中国方案提供先决条件,以及为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提供具体的策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抓好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示范区的建设既能通过辐射效应带动邻区,又能避免全局性风险,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共同富裕示范区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亟需完善,需要专家学者献策建议,更需要社会广泛参与提炼成功经验。

4. 在乡村全面振兴中推进

从现阶段来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堵点是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差距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差距,城乡差距不但决定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而且决定了不同行业就业者的收入差

^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统称“三位一体”分配机制,初次的市场分配以效率优先,二次分配的政府调节以公平优先,三次分配的社会扶持以道德优先。

距,并决定了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因此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以此来缩小城乡差距。乡村全面振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落脚点和突破点,也是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聚焦点,而脱贫攻坚、有效衔接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首要解决的是贫困问题,其次才是乡村全面振兴,但是乡村全面振兴又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设定 5 年的有效衔接期(2021—2025 年)。所以,农业农村现代化将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逐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逐步实现而逐渐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逐渐实现过程中步步逼近。

五、结论与启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组成部分,目前有关理论研究相对比较滞后,内涵认知相对比较局限,推进路径相对比较模糊。本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引入共同富裕,创新性地将其延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科学内涵,分别从时空分异特征分析和推进路径提炼两个方面进行系统性研究。

(1)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 = 共建富裕 + 共享富裕 + 共生富裕,共建富裕意味着大家一起奋斗勤劳致富^[16],共享富裕意味着贫富差距缩小^[10-12],共生富裕则意味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不仅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将其归纳为“生命共同体”协调发展共同达到的一种富裕状态。

(2)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呈现逐步递增态势,但是整体上普遍偏低,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在空间上虽然存在一定相关性,但是这种现象并不强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已有研究^[14,27]在空间相关方面留下的不足之处,

(3)中国共产党探索共同富裕主要有始终创造条件和始终分阶段有重点地逐步推进两个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中国共产党

带领全体人民向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理想目标不断迈进的历史,始终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理念逐步迈进。

(4)从党的二十大踏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主要有党的领导路径、高质量发展路径、示范区建设路径和乡村全面振兴路径 4 个推进路径,既有实现主体,也有实现必由之路,更有具体策略和聚焦点。

综合而言,本文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进行了回应,无论是对学术界还是对实业界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从理论上,本文将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镶嵌在一起,根据两者契合点进行内涵延展,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 = 共建富裕 + 共享富裕 + 共生富裕,并以此为根据重塑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为后续廓清时空分异特征提供依据,也为后续研究推进路径埋下伏笔,更为未来研究提供一种可扩展思路。

(2)从实践上,本文测度了新时代 10 年伟大变革期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水平,从“省域—区域—空间”立体型视角,分析了其时空分异特征,提炼了其推进路径,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和新征程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王鑫.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共同富裕:内涵、价值与路径[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3):24-33.
- [2]张占斌.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内涵、理论与路径[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6):52-60.
- [3]逢锦聚.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协同推进共同富裕[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13(1):3-13.
- [4]吴炜,马慧怡. 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观念的建构与演进[J]. 理论学刊,2022(3):40-48.
- [5]郭晗,任保平.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实践历程与路径选择[J]. 改革,2022(7):16-25.
- [6]沈文玮,李昱. 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J]. 经济纵横,2022(11):1-7.
- [7]殷晓元,彭静.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历史演进和实践方略[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6(5):114-120.

- [8]梅荣政,朱莹.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论述的解读[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44(1):1-8.
- [9]李莹洁.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目标要求和实现路径[J]. 学术探索,2022(9):33-39.
- [10]杨文圣,李旭东. 共有、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2(1):10-16.
- [11]万海远,陈基平. 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量化方法[J]. 财贸经济,2021,42(12):18-33.
- [12]孙豪,曹肖烨. 中国省域共同富裕的测度与评价[J]. 浙江社会科学,2022(6):4-18,155.
- [13]韩亮亮,彭伊,孟庆娜.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共同富裕——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OL]. 软科学: 1-18 [2023-02-0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268.g3.20220218.1626.004.html>.
- [14]席恒,王睿,祝毅,等. 共同富裕指数:中国现状与推进路径[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0(5):45-57.
- [15]高鸣,魏佳朔.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历史方位和实现路径[J]. 中国软科学,2022(8):45-57.
- [16]李海舰,杜爽. 推进共同富裕若干问题探析[J]. 改革,2021(12):1-15.
- [17]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 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 管理世界,2021,37(8):117-129.
- [18]郑石明,邹克,李红霞. 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理论阐释与实证研究[J]. 政治学研究,2022(2):52-65,168-169.
- [19]申云,李京蓉. 我国农村居民生活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视角[J]. 调研世界,2020(1):42-50.
- [20]张金林,董小凡,李健.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研究[J]. 财经研究,2022,48(7):4-17,123.
- [21]傅才武,高为.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与指标体系[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11-24.
- [22]向云,陆倩,李芷萱. 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J]. 证券市场导报,2022(5):2-13.
- [23]刘明月,汪三贵. 以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破解难点与实现路径[J]. 贵州社会科学,2022(1):152-159.
- [24]徐鹏杰,杨宏力,韦倩. 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现代产业体系与消费的视角[J]. 经济体制改革,2022(3):16-24.
- [25]赖德胜.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6(6):10-16.
- [26]方世南. 新时代共同富裕:内涵、价值和路径[J]. 学术探索,2021(11):1-7.
- [27]吕光明,陈欣悦. 2035年共同富裕阶段目标实现指数监测研究[J]. 统计研究,2022,39(4):3-20.
- [28]钞小静,任保平. 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理论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财经问题研究,2022(7):3-11.
- [29]李金昌,余卫. 共同富裕统计监测评价探讨[J]. 统计研究,2022,39(2):3-17.
- [30]韩文龙.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实现共同富裕[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11):19-24.
- [31]陈丽君,郁建兴,徐铨娜. 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构建[J]. 治理研究,2021,37(4):5-16,2.
- [32]郁建兴,任杰. 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J]. 政治学研究,2021(3):13-25,159-160.
- [33]刘秉镰,秦文晋.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与动态演进[J]. 中国软科学,2022(1):62-75.
- [34]张旺,白永秀. 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的理论构建、实证分析及优化路径[J]. 中国软科学,2022(1):132-146.
- [35]DAGUM C. A new approach to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gini income inequality ratio[J]. Empirical economics, 1997, 22(4):515-531.
- [36]张旺,白永秀.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演进及空间相关性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2):84-102.
- [37]李光亮,谭春兰,郑沃林.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共同富裕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为例[J]. 调研世界,2022(4):39-48.
- [38]覃成林,杨霞. 先富地区带动了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吗——基于空间外溢效应的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17(10):44-61.

(本文责编:海 洋)